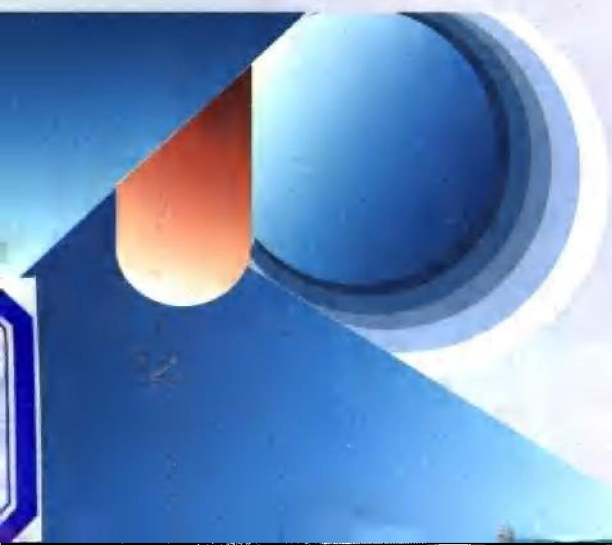


●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中国产业结构 成因与转换

石磊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

石磊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丛书策划 刘子馨
责任编辑 徐惠平
责任校对 韩向群

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

石磊 著

出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14,000
版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7-309-01737-4/F·401
定价 1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顾 问 蒋学模 张薰华 陈观烈
洪文达 叶世昌 洪远朋
尹伯成 苏东水 顾国祥

主 编 伍柏麟

副主编 华 民 张 军 刘子馨
石 磊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 磊 刘子馨 华 民
朱国宏 张 军 苏荣刚
芮明杰 张晖明 陆德明
周伟林 姜波克 袁志刚
徐惠平 黄亚钧 彭希哲
戴星翼

总 序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并在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步步在开创着新局面。生产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提高,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但是,这些成就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面临的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相比,还很有限,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正面临着三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第三,从不发达、不完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向比较发达、比较完善和合格的社会主义转变。在体制转轨、发展转型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既是旷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又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美国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能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处于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理应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文章和经济著作空前繁荣。数一数当前我国出版的书籍和报刊的种类和数量,无疑首推经济领域。需求引起供给,这是正常现象、好现象。但其中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等缺乏价值的作品。出

版社的过度竞争和不正之风,著作人的目标短期化,是形成这类局面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体现在数量方面,更要体现在质量方面。一篇优秀文章,一部高质量的精品,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远胜几十篇、几十部甚至几百部平庸之作。精品力作才是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志。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出版社拟以相对集中且有规模优势的学术群体为依托,欢迎国内外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的参与和赐稿,组织好时代性、理论性和应用性强的选题,出版融专业性、学术性和前沿性于一体的《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专业性指丛书是涵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及其二级学科为范围;学术性表现为资料和观点的引用应准确可靠并注明出处,研究工具和方法科学先进,实证分析基础上引出规范,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前沿性应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属该学科中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学术界还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尚未研究过的,或者能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和资料进行论证并提出新观点、新结论的,总之前沿性要求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为保证丛书预定的目标,出版社将采用国际通行的出版机制,对每部书稿实行两名以上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严格把关,杜绝伪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研究工作的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难免带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反映,值得我们借鉴。借鉴并不等于照搬,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中引出合乎实际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运用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分析工具和方法,以符合国际规范,是必要的。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或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名著,都应该结合实际重新学习和再认识,实事求是地总结和传承借鉴,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创造。

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加快改革开放,推进建设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合格社会主义。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创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框框,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打开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展现出经济学发展的无限广阔前景。这里,既需要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样需要各具体经济领域应用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它们共同构成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大厦。

经济学优秀成果的产生,要经历一个艰辛的学习、思考、探索、研究过程。希望这套《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的每一本,都能以真诚的态度,解放的思想,求实的作风,开拓的精神,从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中提出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在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

伍柏麟
1996年国庆
于复旦大学

序

欲求真,就必须科学地理解现实及其赖以形成的内在机理。《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一书自始至终都反映出作者求真的愿望和努力。

70年代末开始,国内批评与反思建国后实行的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者,堪称其众。有批评其脱离实际者,有批评其效率低下并引致结构刚性者,等等。本书也同样否定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之初的现实可行性,但又不限于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否定,而是把中国充满矛盾的具体国情,同这一战略选择在政治经济上的必然性统一起来。为此,作者冷静地研究自“洋务”以后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何种机理导致“产业结构轻型化”并钳制着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80年代初开始,中国产业结构水平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种种对策研究也应运而生,有主张压缩“长线”,发展“短线”者,有主张政府强化结构调整功能者,有根据国际先例,主张加速第三次产业发展者,等等。本书作者原则上同意这些主张,但不满足于来自直观感觉的结论,而是重笔分析种种结构性矛盾得以生成的内在机理,从主导产业的关联效应、各产业部门对产业波动的不同反应弹性、区域均衡战略的消极后果和经济体制因素对要素流动的强硬制约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研究为什么几次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均告失效,以致结构刚性日益沉积,为什么区域投资均衡反而导致区域收入水平极化,为什么产业发展水平与数量扩张速度严重不对称。

欲求思维逻辑缜密,必须熟悉与论题直接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方法和实践过程。根据本书的结构安排、繁纷的统计分析和对有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可以判断,作者在这三个条件上下了一番苦功。

“结构成因与转换”是一个动态概念。历史跨度过小,难以展示其动态过程的连续性;历史跨度过大,容易陷于繁琐,冲淡主要因素间的相关性,无助于说明建国前“产业结构轻型化”的事实和建国后产业结构失衡的必然性。作者首先截取了“洋务”至国民党政政府彻底败落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分析了新中国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赖以产生的经济背景,再以新中国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下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为主线,重点分析了与结构问题关联度较大的几个横切面,并层层剥开,予以实证。在几乎所有在作者看来有必要展开争议的问题上,其逻辑性都显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证分析能力。尤为突出的是第二章第二节“特殊的二元结构”、第四章第二节“中国产业波动性质辨析”和第七章第四节“市场规则”。

“二元结构”理论早已为经济学界所熟知,但由中国的历史事实研究“二元结构”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以最终需求、中间需求、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程式,论证其逻辑的必然,这既使“二元结构”理论分析超出了大家所熟知的范围,也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这一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经济学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可能尚显单薄。

把中国在非市场体制下的经济波动纳入“周期性波动”,这在经济学界已似成定式。本书作者充分肯定了经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从何而来提出疑问,并由理论到实践地对周期性假说作了合乎逻辑的否定。对于经济学范畴,学者们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但范畴本身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外化。非市场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是否可以外化出同一于

商业循环的“周期性”呢？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事实上，这里涉及市场经济与经济周期或商业循环的关系问题，起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于此的科学假说前提下，作者的逻辑推理是严密的。

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但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把握，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满足于概念认同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内涵比我们已有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本书作者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践中总结出四个基本规则，借以透视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而且对每一规则及其功能机制的认识都严格地基于商品生产内在矛盾运动。也许经济学界没有人再对商品生产内在矛盾感到陌生，以致不屑于再去多想。然而，恰恰是从大家都早已熟知的这一矛盾体系中，作者理解了马克思曾经明确分析过而被人们忽视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更深层规定和更丰富的内涵，并循着这些规定和内涵，合乎逻辑地发掘出一系列值得深究而又与作者论题有关的意蕴。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无启迪。

如果不是受到论题的限制，作者似应沿着第七章已经拓开的思路，进一步回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以非均衡发展模式为前提（中国也只能如此），如何有效地降低存量结构刚性，优化资源配置体系？

其二，按照作者在“导论”中对所选主导变量的界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主导变量将以怎样的关联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换？

其三，在市场体制下，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组织整合总是相伴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如何通过自身的制度创新，使这二重的过程更加稳定高效，降低产业整合和要素整合过程所必然发生的短期成本？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期待着作者继续以求真求严求精的学术

态度,提出更丰富、可行的设想,作出更加严密的论证和更加准确达意的表述。

雍文远 李鸿江
1996年8月于上海

ABSTRACT

Basing on the statistics and logically substantial analysis, the principal subjectives are to analyse the alteration course of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lativities between the leading variable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s presented in the book can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play different parts in the alte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former, as a crucial aspect, sets up the limitation for the conduct of macro sectors to allocat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a concrete systematic regulation, derived micro actors reaction capacity to the alte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macro sectors' behaviour as well.

2. There exist two type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that China has experienced. Based upon the noncompetitive equilibrium system, the increment adjustment resulted in the structural rigidity storing increasingly.

3. During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Chinese dual-structure

had or have been far from the turning point by Lewis. As a result, the economic growth could not stimulate and modivate the industries to divide.

4. Business circulation may be a kind of dynamic mechanism to optimal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5. The alteration of the regional structure and that of stage-separation relative with the choice and development in leading industries.

6. For efficiently adjusting and driving the structure into optimalization with lower cost,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means and the stratagic train of thought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本书的主要结论

本书以大国模型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程式和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复杂现实为背景,在统计分析和逻辑实证基础上,研究了新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各主导变量之间的关联机制和结构调整失效的根源。

1. 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各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前者作为初始条件限定了宏观部门配置资源的行为倾向;后者作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既影响宏观部门调整产业结构的行为方式,也影响微观部门对结构变动的反应程度。

2. 产业结构转换有常规转换和非常规转换。中国选择的是后者。这种转换型式在非竞争性均衡体制下使存量矛盾日益沉积,产业体系既严重失衡,又缺乏调整弹性。

3. 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中国产业结构状况要求采取存量—增量组合,而实际做法相反,以致历次结构调整总是收效甚微。

4. 周期性经济波动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中国历次经济波动多半偏离周期性常态,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长期不对称,行政性的收缩与膨胀总难以避免。

5. 区域结构和区域级差变动,与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其传导效应高度相关。80年代以前,在主导产业上的区域投资均衡战略,降低了产业分工水平和要素边际产出率。80年代以后各地区在短期利益驱动下,普遍出现主导产业轻型化倾向。这是中国在高增长阶段出现产业体系轻型化结构的主要原因。

6. 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较小的成本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在纠正结构调整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培植并遵循市场规则等方面寻求突破。

1 导 论

产业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重组的过程。某种状态的产业结构,无非是各种产业载体在分化与重组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关联状态及其空间存在形式。无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总构成产业分化与重组的一般基础。由于经济的、自然的和技术的原因,产业关系的不断整合,既延长了产业链条,又优化了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并使传统的、功能残缺的区域性产业体系逐步溶入最广泛的产业社会化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

1.1 对产业和产业结构分类的说明

理论上如何对产业进行分类,完全取决于研究产业结构的具体目的。迄今为止大体有六种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霍夫曼工业化标准分类、工业结构分类、资源集约度分类和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

先后由阿·费歇尔(A. Fisher)、柯林·克拉克(C. Clark)和库茨涅兹(S. Kuznets)提出、论证和深化普及的三次产业分类法,适用于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相关变动的内在关联机制,反映一定时期的工业化水平,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分类法。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是对三次产业分类法的扩展和具体化,其无

所不包的特点更适用于研究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轨迹。霍夫曼工业化标准分类法将全部产业分为消费品产业、资本品产业和这两者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印刷、造纸、橡胶等中性产业),有利于衡量一定时点上的工业化水平,划分工业化阶段。工业结构分类法将工业本身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两部分,旨在分析社会资源如何在两者之间作重心转移,以显示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资源集约度分类法旨在根据不同产业吸纳资源能力的差异,寻求宏观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并参照一定时期社会可支配资源的存量与结构,确定产业调整战略和政策。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超越了对产业分工结构的一般描述,而把总量与结构、分工与交易、价值实现与社会需求结构、生产与消费、价值构成与使用价值构成等关系集于一体,用于分析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结构对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经济关系再生产的影响。与前几种分类法相比,资源集约度分类法的分类标准弹性较大。工业化过程会改变各产业的资源集约型式,比如某一产业由劳动集约型向资本或技术集约型转变,等等。因而,这一分类更富有动态特征。

以上分类的差异,仅体现于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相对于产业结构分析所必需的知识体系而言,每一种分类都各有其长。基于这一考虑,并根据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需要,本书不排斥任何一种分类法,在主要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法和工业结构分类法的同时,兼及其他分类法,以便于从多侧面揭示我国产业结构形成与转换的内在机理。另外,国际上对三次产业所属部门的确定尚有差异,本书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划分三次产业的标准和范围,划定三次产业的口径:农业为第一次产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工业为第二次产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煤气、电力和自来水生产;服务业为第三次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仓储、批发和零售商业、外贸、金融、房地产、科学、教